

《共產黨宣言》——二零一四年的基督徒解讀

Santiago Miro 著 傅蔚琳譯

一個震撼的閱讀經驗

我十分興奮最近讀到兩本書，一是教宗方濟各的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另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編者按：以下簡稱《宣言》，中譯本取用中國大陸通用的版本。）這是我所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中最具有影響力及最為人所知的作品。當我閱讀《宣言》的第一部分時，我不禁問：「究竟是誰在說話？是馬克思還是教宗方濟各？」難怪當教宗方濟各發表《福音的喜樂》時，美國的一份報章形容它的內容為「純粹的馬克思主義」！首先讓我們讀一讀下文。

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

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宣言》1·14—16）

然後，又讓我們看看以下引文的作者是誰？（編者按：本文以下簡稱《喜樂》：由於《福音的喜樂》中文版尚未推出，譯者按照英譯本翻譯。）

讓我們拒絕金錢的崇拜！我們之所以對窮人的呼聲充耳不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容讓金錢管轄我們的生活和社會。金融危機使我們忽略背後更深層的人性危機，就是我們否認人的卓越地位。我們製造了新的偶像。古人對金牛的崇拜（出32:1—35），現在以新的、無情的方式，並在金錢崇拜以及非人性化的經濟活動的掩護之下，重新出現。

這兩段文字的共通點，在於作者對生命以及對人的深切關懷。一個基督徒讀《宣言》時，不難發現其中一些思想，與基督信仰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有相當的出入，例如它提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宣言》1·14）以及視「法律、道德、宗教」為「資產階級偏見」。（《宣言》1·17）我們繼續往下讀，更會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將由資產階級造成的社會現象，視為普通的負面現象；他們認為這些腐敗的現象，是人類歷史唯物發展的永恆定律的結果。它們是歷史發展中必經的階段，但最終會在共產主義中達到完滿。

但在《宣言》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它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同時也有不少與基督信仰相反的元素。我們清楚知道，除了一些最基本的關切之不平衡；不但如此，它更暴露了現代金融經

濟體系對人的漠不關心。在它的統治之下，人被化約成「消費的動物」。（《喜樂》55）

共通點；在其他的層次上，它們是完全對立的。這實在不足為奇，因為《宣言》的前設是無神論，而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建基於天主存在的事實。畢竟「無神」與「有神」截然不同：它們是所有差異之中最基本的一個。因此，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必須先從聖多瑪斯在《神學大全》中首先提出的問題開始：神存在嗎？

《宣言》思想的兩個框架

若我們繼續讀下去，不難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無可避免地受其身處的時代的兩種思想傳統所影響。第一種影響來自超過兩千年歷史的「偉大的守則」——《聖經》，這是整個天主教信仰的根基。第二種影響來自兩百年前，人類思想史中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思想的興起，其後由黑格爾以其唯心論總其成。

《聖經》為《宣言》提供了兩個基本思想。《宣言》與天主教傳承的第一個共通之處，在於它們

對受壓迫者的關懷。在對社會公義的關懷這件事上，《宣言》的立場基本上與教會的社會訓導是一致的，這一點可以從教宗方濟各的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之中得以引證。當我們閱讀《宣言》時，不難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貧窮和受壓迫者的深切關懷。在此讓我引用《宣言》中的一、兩個篇章，與教宗方濟各的宗座勸諭作出比較。

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售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競爭的一切變化、市場的一切波動的影響。（《宣言》1. 30-31）

現在，讓我們看看教宗方濟各的教導：教宗說，「今天，所有事物都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的法則支配，強者往往搶奪弱小者僅有的資源來餵飽自己。結果，無數的人發現自己被排斥和被邊緣化。他們沒有工作，沒有將來，沒有出路。人被視為商品，用完即棄。」（《喜樂》53）讓我們再看看另一段，馬恩二氏在《宣言》的表述：

雇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

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佔有……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佔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佔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宣言》2. 22-23）

另一方面，無獨有偶，教宗方濟各在處理貧富懸殊與社會關係時寫道，「當少數人的收入在倍

增時，他們享有的富裕卻與大多數人相距愈遠。這情況是一些堅持市場經濟與金融投機絕對自由的意識形態造成的結果。……一個新的暴政就此誕生了，它雖然無形可見，但確實存在於人的生活中，無情地將自己的法則強加於所有人……在這制度下，所有妨礙收益增長的事物都被吞噬，……所有脆弱的事物（例如自然環境）都不能抵抗它的力量。」（《喜樂》56）

馬恩二氏與教宗方濟各不約而同地在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義中找到暴力的根源。一個不公義的社會所造成破壞，在《宣言》中表露無遺。「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宣言》1.51）教宗方濟各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就像美善有其感染力，對社會中的罪惡（即不公義）的容忍，同樣能夠帶來極壞的影響，靜靜地動搖著看似穩固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每一個行為都有其結果；深植於制度之內的罪惡常能導致崩潰與

死亡。」（《喜樂》59）

在這共同之上，《宣言》與《喜樂》之間卻有根本的區別：教宗方濟各認為導致暴力的不公義情況是可以避免的；社會的不公義是人濫用自由的結果。馬恩二氏卻認為社會的不公義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這是歷史唯物決定論的結果。

《宣言》與天主教傳承的第二個共通之處，在於它們對人類發展歷程的統攬全局的洞察及理解。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對人類歷史的看法，與聖經中的敘述頗為相似。聖經以伊甸園的故事開始，上主與人類密切來往，而以新耶路撒冷的景象結束：人類回復其原初的狀態，以無可言喻的方式，恢復與天主的親密關係。

《宣言》的第一部分開宗明義地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宣言》11）在一節的註腳中，恩格斯說明這裏所指的歷史，是指以文字記錄下來的歷史。至於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認同當時的歷史學家的發現，

指出史前時期的人類社會已經奉行「共同擁有土地」的制度。「從愛爾蘭到印度，這是原始社會所奉行的制度」；「這就是最原始的共產社會。……隨著原始社會的瓦解，社會開始分化，於是產生了不同的、最後互相敵對的階級。」

由此可見，人類的歷史以共產社會開始；按照《宣言》的觀點，歷史亦將以共產社會為終點。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毫不留情地批評其他思想體系中的烏托邦理想，並將之形容為「新的社會福音」或「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但是他們在《宣言》第二部分的結尾寫道：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说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

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宣言》2.73）

這最後一句說話可謂非比尋常！這思想正是這一百五十年以來，所有共產主義革命和共產國家背後的理念！我有一個疑問，就是在所有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文獻中，能否找到一句比這句話更清楚表達出教會對社會公義的看法。

不過，在馬克思的其他思想源頭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支持這種烏托邦式樂觀主義的理據。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樂觀思想源自黑格爾的「正—反—合」的哲學。至於《宣言》第二部分的最後一句所反映出來的，則是源自聖經的「默西亞樂觀主義」——馬克思的社會理念經常被形

容為「默西亞主義」。畢竟馬克思是猶太人的後裔，亦曾領洗成為基督徒。我們也可以說，馬克思的默西亞主義是「瘋狂的默西亞思想」；這使我聯想到第二個影響《宣言》的思想框架傳統——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與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康德的不可知論與黑格爾的唯心論是現代無神論的其中兩個源頭。關乎對人類的存在基本理解，馬恩二氏的觀點與教會的看法完全相反。這分歧基本上是哲學的，其次才是神學的。

馬克思親口說過他的哲學是「黑格爾哲學的另一面」；就是說他的思想是黑格爾唯心論的「唯物化」版本。黑格爾的思想將康德的不可知論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正—反—合」發展模式，使真理成為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原理。這是由於「正—反—合」中的「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被理解為「對立的」(opposite)，也可以被理解為「矛盾的」(contradictory)。因此，「反」的角色不只是對「正」的補充，也可以是對「正」

的否定。黑格爾喜歡談論「否定的力量」(the power of negation)。這種折衷思想的結果，就是將真理視為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普遍原理，甚至視人的發展為歷史唯物法則的必然進程。

「真理」是相對的

「真理是相對性的」，這樣的觀點泛見於整本《宣言》。兩位作者不斷提醒我們真理是相對性的，取決於那些思考的人的經濟條件。因此，他們對那些堅持「永恆真理」的人提出挑戰：

你們既然用你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觀念來衡量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主張，那就請你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你們的利己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係變成永恆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己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宣言》2. 37-38）

在《宣言》中，只有二處提及對宗教的挑戰，每一處都是根據「真理相對論」的基礎而提出的。《宣言》第一部分首次提到宗教：「【資產階級】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宣言》1.14）另一比較間接的描述是：「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被歷史發展的洪流消除」。（《宣言》1.18）《宣言》第一次提到宗教，是在第一部分有關無產階級的篇章：「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宣言》1.47）第三次是在第二部分，針對普遍宗教和思想所作出的攻擊：

從宗教的、哲學的和一般意識形態的觀點對

共產主義提出的種種責難，都不值得詳細討

論了。……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簡單些說，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

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麼呢？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宣言》2.57-59）

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這正是教會在其社會訓導中一直持守的原則。

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似乎世上只有一項永恆不變的真理，就是「歷史的車輪」以及其背後的唯物論法則。共產黨對人類的貢獻，就是對歷史唯物論的法則的理解，以及隨之而來的行動。

「歷史的車輪」決定人類歷史永沒回頭

「正—反—合」的歷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法則，《宣言》稱這發展過程為「歷史的車輪」。（《宣言》1.45）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這「正—

馬恩二氏隨後用了整整一頁紙來強調「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的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罷了。」（《宣言》2.61）這種視真理為相對性的觀點，乃是對真理的完全否定，教會視這些真理為不可變的指標，指引我們反省和規劃社會的改革。舉例來說，《宣言》質疑「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是）個

反—合」的進程，不論這進程是黑格爾哲學中的「精神上的」，抑或是馬克思的「物質上的」。為馬克思來說，立意阻止這發展進程是十分愚蠢的事。社會思想家的工作就是「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宣言》1.43）因此我們應該容許歷史發展的力量在人類社會中自由運作，讓導致分裂的因素在社會結構中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嘗

試改變社會中的罪惡境況，我們就是跟社會發展的洪流對抗。如果你跟歷史發展的力量對抗，你是注定失敗的。我們應當讓「反」的力量，將「正」提升至「合」的境界。《宣言》的最後數段這樣說：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宣言》4.8, 12）

按照《宣言》的觀點，為了促進人類的發展，唯一真實的社會策略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發展，因為其他社會運動都沒有洞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定律。在《宣言》中提及的社會運動

——其中有一些與天主教社會訓導頗為相似——包括反動的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全都是徒勞無功，這是由於它們「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宣言》3.3）

在這裏，讓我們看看最先兩種與最後兩種思想家的特質。在爭取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亦即真正革命的階級）的支持的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視他們為競爭者。我選擇這四種思想體系，是由於我在閱讀《宣言》時，我經常想起在一九八八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稱聖若望·鮑思高為「青年人的慈父與導師」。聖若望·鮑思高曾經為貧困青年到處（不論是有錢人還是窮人）乞求生活必需的物資。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是對的，這就意味著聖若望·鮑思高這位青年人的慈父與導師，為那些貧窮的與被遺棄的青年人所

做的事情是錯了。不過，我深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錯的，而聖若望·鮑思高是對的，因為我相信真理是絕對的，並非相對的；我對歷史的觀點不是建基於唯物論的無形力量，而是那全能的與慈愛的天主的真實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兩種競爭者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這兩種都是傳統的貴族階層和神職人員針對現代中產社會所作出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不起他們對社會的批判，因為他們的理論沒有實際的基礎，而只是停留在文字與思想的抽象層次：

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詞，屈尊拾取金蘋果，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一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

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制，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欲、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宣言》3.9-11）

馬克思這種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例如他認為物質與精神不可能同時存在），使他無法接受天主教能夠同時肯定婚姻與獨身的價值、私有財產的重要與福音中的貧窮、國家的權力與人民的平等。在表面上，共產主義嘗試推翻它與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接觸點（例如婚姻和私有財產）；在更深的層次上，這反映出兩者的最大差異，在於其思考模式。最後兩種競爭者，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宣言》這樣描述保守的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

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

這一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願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願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他們）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並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改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係的改變。（《宣言》3. 36-37, 39, 40）

至於「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宣言》這樣寫道：

誠然，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主要是代表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在

他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只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他們要改善社會一切成員的生活狀況，甚至生活最優裕的成員也包括在內。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特別是一切革命行動；他們想通過和平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通過示範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辟道路。

因此，他們一貫企圖削弱階級鬥爭，調和對立。他們還總是夢想用試驗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空想……（那）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為了建造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就不得不呼籲資產階級發善心和慷慨解囊。

因此，他們激烈地反對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認為這種運動只是由於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發生的。（《宣言》3. 50-52, 55, 56）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由於他們不相信天主的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看到「和平的

途徑」所能帶來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在二十世紀中的偉大人物身上得以充分展現。印度聖雄甘地與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之所以成功，正是由於他們承認天主的存在。

馬克思社會分析對今日人權討論的貢獻

這次再讀《宣言》，不但令我欣賞馬恩二氏對貧苦大眾的深切關懷，更令我欣賞馬克思的社會分析的另一個面向以及其永恆的價值。馬氏提出的问题，就是中產階級是否真的關注「人權」的議題；這與馬克思的「相對真理觀」不謀而合。

馬克思的「相對真理觀」固然站不住腳，但這另一個面向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人的心理；這就是說，我們很容易將我們的動機合理化，我們會粉飾那些我們沒有意識到的、隱藏的動機。馬克思曾被一些學者稱為三大懷疑論者之一。（其他兩位是尼采和弗洛伊德。）這三位思想家鼓勵我們要懷疑我們的動機是否純正。馬克思邀請我們

查看我們的動機，是否出於物質上的舒適；尼采質問我們是否透過侍奉天主，逃避我們對自己和社會的責任；弗洛伊德要問，我們的思想、言語和行為，是否出於未被滿足的性需要？我們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是為了尋求性方面的滿足？

讓我們看看馬克思如何暗暗地批評那些提倡「人權」的中產階層：他認為他們的動機其實是維護自身的利益。「你們所理解的個性，不外是資產者、資產階級私有者。」（《宣言》2.31）教宗方濟各亦提及這種自我欺騙：「很不幸地，就連人權也被用來維護個人的利益，以及有錢人的權利……我們必須重申，社會中比較富裕的人應當捨棄他們的一部分權利，好使他們能運用他們的資源，慷慨地為他人服務。」（《喜樂》190）

展望將來：我們如何選擇？

當我們展望將來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很諷刺的事實，就是今日的共產黨並未延續馬克思和

恩格斯在《宣言》中對社會的基本關懷；反之，我們可以看到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如何延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為我來說，這意味著社會關懷必須在「天主存在」的大前提下，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為社會中的弱小和受苦者帶來益處。因此，在結束本文時，讓我引用幾段《喜樂》的內容；如果你沒有注意，你可能會以為這些文字是來自《宣言》的。今天，真正召叫我們去關懷弱小、聆聽「貧窮者的哀號」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天主教教會的社會訓導！

就如第五誡「母殺人」為我們設下了清晰的界線，好使人的生命的價值得到保障，今天我們都必須對製造分化與不公的經濟說「不」。這樣的經濟是會殺人的……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們失去對貧窮者表現同情與憐憫的能力，對他們的呼號充耳不聞。

(《喜樂》53-54)

每一個基督徒，以及每一個個體，都被召叫

成為天主的工具，為窮苦人的解放而服務，使他們能真正成為社會中的一分子。這要求我們懷著柔順和專注的心，聆聽貧窮者的呼號，並給予所需要的援助。(《喜樂》187)團結是一個自發的迴響，來自那些認同財物的社會性先於私有權的人，他們深信「財富乃為人人共享」，而不只是為個人的益處。財務私有權使一個人能夠保護和增加他的財物，好使他能更有效地為普羅大眾的利益而服務；因此，我們需要作出團結一致的決定，使窮人能夠得回他們本應擁有的。(《喜樂》189)

這不正是《宣言》的指向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宣言》2.73) □